



社会工程的逻辑

——从社会批判到社会建构

田鹏颖 著



科学出版社

013051736

C91
235

社会工程的逻辑

——从社会批判到社会建构

田鹏颖 著



科学出版社



北航

C1660390

C91
235

013021738

内 容 简 介

本书融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重要思想理论元素,以资本和科技双重逻辑为主轴,深入讨论人类面临的现代性“纠结”与“苦痛”,主张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应当从断裂走向融合,对现代社会的态度应当从批判转向建构;提出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尊重社会主体人的首创精神,又需要宏大切实的“顶层设计”,以实现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运行、社会创新的合规律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本书可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高等学校从事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师生以及党政机关公务员等参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工程的逻辑:从社会批判到社会建构/田鹏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3-037761-6

I. ①社… II. ①田… III. ①科学社会学-思想评论 IV. ①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3946 号

责任编辑:张 宇 余 丁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字数:302 000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田鹏颖, 哲学博士, 国家二级教授, 东北大学兼职教授, 辽宁省优秀专家, 辽宁省特聘教授,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与政治学院)院长, 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辽宁省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 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辽宁省哲学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教学与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和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 20 余项, 荣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3 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18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近 20 部。

前 言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正值 21 世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尚未见底之时，作为地球村的一个成员，中国也难独善其身，所谓“风景这边独好”的论断或期待，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是盲目乐观主义的表现。其实，傻笑往往比眼泪更可悲。主张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霸权地位已经遭遇严冬，而马克思主义正在摆脱“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种近视眼光预测的不祥阴影，然而“世界并不太平”的历史判断和生命力依然存在，而且人类自我制造的副产品——自然枷锁正在禁锢自身。如果唯物辩证地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应当承认，在反思人类共同携手应对生态危机、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反思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的本质，更应当清醒地反思社会主义的自我处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理解当下社会、自然、宇宙和文明的理论工具，也是我们把握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截至目前，由其所达到的洞见非其他思维方式所能替代。

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我们进一步接近客观真理指明了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我们不怕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挑战；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我们不会拒绝任何对之理性探究的研究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者，我们不能错失马克思主义发挥方法论功能的挑战与良机。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俯仰古今，情思万端。不知有多少思想家、哲学家感叹人类社会的沉浮跌宕，又不知有多少有志之士为构建和谐事业而奔走呼号。

黑格尔说：“哲学没有对工程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工程不能以此为借口忽视哲学。”工程与哲学在历史上的关系演变，具体而言即从工程与哲学隔山相望的攻击，再到工程与哲学之间的相互爱慕，最后达到彼此交融，孕育出了社会工程。社会工程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邂逅，而是必然的创造。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孕育了社会工程并促其茁壮成长。

时代孕育的不仅有社会工程，还有理性的人。当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便开启理性地思考“我是谁？”“我从那里来？”“我如何往哪里去？”……

马克思唯物史观问世 160 多年，世界历史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这些问题在信息时代被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社会工程问题，于是“社会工程的逻辑”问题便合乎逻辑地浮出了水面。

当下和未来研究社会工程的人关注的焦点,更多地从社会工程的表层概念深入到社会工程的内部逻辑,而本书则是基于对当代人的思考而做的解答。

全书共8章。第1章,从全局出发,从思想中把握世纪难题,即关注人类命运的时代转折,通过哲学研究的“失语”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断裂背景讨论社会工程。第2章,分析现代性的生成与现代性焦虑,从“文艺复兴”开始寻找批判指向与社会价值,进而分析现代性生成与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其现代性为人类带来的福祉与“苦痛”。第3章,重点考察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即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相互摩擦及至后现代主义出场。第4章,主要探讨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主旋,即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5章,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构建维度,从马克思为建构而批判、马克思为改造而认识、马克思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建构、马克思为重建社会而阐释“历史科学”等四个角度加以阐释和说明。第6章,通过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唯物史观的理论前设、唯物史观视野下的社会关系生产新形态和唯物史观的理论表达方式,为社会工程转向提供理论支撑。第7章,主要通过社会工程的“尚未”范畴、社会工程的“乌托邦”理念、社会工程的形而上学偏转和社会工程的实证追求,为社会工程的登场抛砖引玉。第8章,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精神着重立足当下,阐释社会工程的人文关怀、整合功能、理性觉醒和现实救赎。

应当说,这8章的内容丰富,逻辑脉络清晰,但对社会工程的研究还只是管中窥豹。希望那些为现代社会而忧虑,对社会工程有兴趣的专家、学者能够重视社会工程这个当下重要的问题域,以待共同学习、研究和创新,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的积极建构者。

作 者

2013年2月于沈阳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思想中把握的世纪难题	1
1.1 人类命运的转折	1
1.2 哲学研究的“失语”	8
1.3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断裂	11
第 2 章 现代性生成与现代性焦虑	18
2.1 “文艺复兴”的批判指向与社会价值	18
2.1.1 追溯文艺复兴	18
2.1.2 文艺复兴的反思与批判	22
2.2 现代性生成与演化的动力机制	24
2.2.1 现代性的由来	24
2.2.2 现代性生成机制的探讨	30
2.3 现代性福祉与现代性焦虑	33
第 3 章 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39
3.1 设计“尚未完成的设计”	39
3.1.1 设计是人的理性产物	39
3.1.2 从现代性情节梳理理性设计	42
3.2 现代性悖论与后现代性悖论	44
3.2.1 现代性悖论的具体体现	44
3.2.2 后现代性悖论的产生	48
3.3 后现代主义的锋芒及其缺失	53
3.3.1 后现代主义的出场	53
3.3.2 后现代主义的锋芒	55
3.3.3 后现代主义的缺失	58
第 4 章 现代社会理论的批判主旋	60
4.1 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	60
4.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66
4.3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72

4.3.1	《共产党宣言》对现代性的批判	74
4.3.2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83
第5章	马克思的社会构建维度	92
5.1	马克思为建构而批判	92
5.1.1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现实基础	93
5.1.2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具体体现	96
5.2	马克思为改造而解释	104
5.2.1	认识的改造功能	104
5.2.2	实践活动的认识功能	107
5.3	马克思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建构	112
5.3.1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生命力	112
5.3.2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建构	118
5.4	马克思为重建社会而阐释“历史科学”	121
第6章	唯物史观的社会工程转向	131
6.1	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	131
6.1.1	历史中的唯物史观	131
6.1.2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价值	134
6.2	唯物史观的理论预设	141
6.2.1	唯物史观的悬设	141
6.2.2	社会工程的萌生	148
6.3	唯物史观视野下社会关系生产新形态	149
6.3.1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在“全面生产”中的核心地位	150
6.3.2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生产”理论的本体论价值	153
6.3.3	马克思“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工程本质及其启示	155
6.4	唯物史观理论表达方式的转变	157
6.4.1	唯物史观的三种职能	157
6.4.2	唯物史观表达方式的转变	162
第7章	社会工程的建构主题	168
7.1	社会工程的“尚未”范畴	168
7.1.1	“尚未”范畴的解读	168
7.1.2	社会工程的未来旨趣	172
7.2	社会工程的“乌托邦”理念	177
7.2.1	乌托邦思想的把握	177
7.2.2	社会工程的乌托邦理想	180

7.3 社会工程的形而上偏转	185
7.3.1 社会工程的形而上追求	186
7.3.2 社会工程的基本特征	188
7.4 社会工程的实证哲学追求	192
7.4.1 实证哲学的丰富内涵	192
7.4.2 社会工程的现实任务	196
第8章 社会工程的基本精神	198
8.1 社会工程的人文关怀	198
8.2 社会工程的整合功能	204
8.3 社会工程的理性觉醒	211
8.3.1 社会工程的当代思考	211
8.3.2 社会工程的理性觉醒	215
8.4 社会工程的现实救赎	216
8.4.1 现实矛盾与危机	216
8.4.2 社会工程的顶层设计	218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29

第1章 思想中把握的世纪难题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现代德国哲学家石里克认为：“哲学事业的特征是，它总是被近在起点上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一个解答都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①马克思明确指出：“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按照这些哲学大师们的告诫与启示，我们应当深入地而不是肤浅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创新地而不是保守地在哲学视域里把握当下的世纪难题和世界难题。

1.1 人类命运的转折

如果把“我们”解析为大写的“人类”，那么，在21世纪第2个10年已经开启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发出这样一个也许振聋发聩的“天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

虽然我们之“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但“所问”并不仅仅是现在对过去的追问，火山对岩浆的追问，而是有限对无限的追问。这种严肃而谨慎的追问，在今天也许显得更加紧迫、更加深刻、更加让我们无法回避！

自20世纪70、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灾变：中国三位政治巨人像历史的流星不顾天宫的挽留，划破无垠的夜空轰然陨落；人类罕见的巨大强震，让20万生灵撒手人寰，偌大的华北工业重镇唐山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而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主义也正经受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验与挑战。新世纪头十年还未结束，中国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强震和甘肃舟曲地震泥石流接踵而至，国际金融危机更将东西半球搅得周天寒彻。

在这种背景下，“文化自觉”问题不能不成为主流媒体及学术界的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冷战

^① 石里克《哲学的未来》转引自《哲学译丛》1990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部落、各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①

其实,早在1970年元旦刚过,罗马俱乐部就专门讨论人类面临的灾难问题,把三个著名的报告展示在世人面前: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尖锐地提出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第二个报告——《在转折点上的人类》,强烈呼吁向零增长模式进行一种无痛的过渡,并不说增长越高越快就越好;第三个报告——《世界政府与全球意识》,明确主张以欧共体也就是欧盟的形式来实现人类的政治与精神联合,表达对全球化和世界政府的一种期待。罗马俱乐部的这三个报告的一个核心是: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定性地依赖于它与地球上其他生命的态度和关系。不断蔓延的生态灭绝导致地球上维持生命的能力在不可逆转地退化,全球生物的单一化、人工化,还有各种形式的杂交培育,再加上生物工程、遗传基因,包括克隆、破解了的遗传密码、合成核糖核酸、微波辐射、低温试验等,这一切使地球上的生物,甚至也包括我们人类,都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物种。核武器与生化武器使种族灭绝和人类灭绝终于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人类命运也就真的与地球上的一切生物连成一体。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中国命运向何处去?世界命运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命运向何处去?生态文明命运向何处去?

一系列世界和世纪难题悉数登场,非常醒目而严肃地摆在人类面前,让人目不暇接:

世界范围内曾经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和建设)遭受的让“亲者痛仇者快”历史磨难,发出了人类文明发展“路线图”走向究竟如何,曾经被一些社会主义者奉为“普遍真理”、“永恒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是否已经寿终正寝?自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和引导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在欧洲徘徊,而且曾经势如破竹。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革命和建设)风起云涌,波澜起伏,曲折发展。这一历史形势,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批判和反思。与此同时,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强化如何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并试图单

^①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5.

方面解除意识形态之争,阻断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影响。在连续的和以新的形式延续的“冲突”与“终结”的话语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类历史将以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宣告结束!?

人类历史从“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而全球化浪潮的推波助澜,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现代性问题,向人类提出“现代性”何以成为问题?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现代性问题是否“有药可医”?现代性悖论能否在“风和日丽”中得到消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或者说资本逻辑催生并维持着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这一辩证逻辑,马克思早在“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伟大思想中做出了预言。可以洞悉的是,当今的全球化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润至上的价值观。它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将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推向全球,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蒙上了阴影。生存和发展的全球困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理念的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危机,也即所谓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境遇中,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危机,建立公正合理的人类生活新秩序,不仅是当今各国政治家们费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早年德国古典哲学开先河者康德倡导的“全球公民”正在努力的实践,更是需要人类深度回应和理性深思的重大世界和世纪难题。

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惊涛拍岸,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加剧了现代社会风险程度,拷问着传统的生命伦理,再次向人类提出了“我是谁?”“我怎么了?”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20世纪40年代以来爆发的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包括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新科技革命,正日益迅速而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广阔领域之中,并推翻着我们的时间观,我们对远近空间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但每一种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的事实。”^①科学技术的超常规跃进同时也带来了难以估量且必须高度警惕的社会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德文 Risiko）本身并不是“危险”或“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亏损和伤害的起点；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恰恰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21 世纪的科技已经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險，而且风险已经全球化，以至于现代世界已经成为全球风险世界。整个人类都已经坐在文明的火山之上。由于现代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常规性，在风险社会当中，人类已经没有必要盲目地崇拜所谓的科技专家，而应当以安全标准为基础，建立决策机制和安全举证机制，以此来明确具体的负责人，从而使决策者——责任者透明化、具体化。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风险状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又不是传统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状态。除了前工业社会的传统风险（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等），依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外，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诚信危机、安全事故等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正处于高发势头。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得现代风险的影响已超越国家疆界。如国际金融风险、环境风险、技术风险、生物入侵等随时可能对我们的安全造成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承担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责任，如何界定社会风险责任，均值得人们深入探究。

21 世纪的科学技术面临着严峻的伦理和道德挑战，蕴涵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克隆技术中的伦理问题，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原则问题，网络技术中的道德预设问题，以及如何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问题，如何在技术伦理视角和方法之外建立道德哲学的维度问题，如何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问题等都表明，在科技手段高度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在科技普遍使用和人类行为后果越发不确定的风险时代，如何寻找道德共识并提供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世界性课题。因此，人类不禁发问：“历史的终结”的预言价值几何？“中国模式”的世界历史价值如何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模式，既为当代世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蓝本，更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成长壮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同时也使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只有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具体形态模式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样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具体论断、观点与时俱进变动性的关系,才能在坚持与发展的理论创造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前进的方向。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内容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曾经讲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在西方一些学者的视野中,一个人口众多、地大而未必物博、经济社会发展着实相对落后的中国,如何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实现华丽转身,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百思不得其解的“斯芬克斯之谜”。

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与学术探索,对人类面临的诸多世纪难题的解析与诠释,很有可能成为人类,特别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使命。对这些重大理论(学术)问题的哲学破解,很有可能成为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

人类在世纪之交,在21世纪当下,其命运面临着一个重大转折。

“命运”,也许没有但却是长久地横亘在人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利剑”。英文系统中有两个词,一个是 destiny,一个是 fate,一般都被国人翻译为“命运”。其中 destiny 具有强制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之意,而 fate 则略有不同,即 fate 不是宿命,不是命数,更不是命中注定,而只是一种“关系群”。fate 是把人们置于一种“关系群”之中,“被置于”则是不可抗拒的。fate 一旦把人们置于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视野中的天、地、人、神枷锁之中时,人们则无可逃避。

我们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脉络,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化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在这两个关系中把握当下人类的命运及其转折,也许不无启示。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来考察:人类为扩大自身利益而统治自然世界与不断统治自然世界带来的严重后果之间的尖锐矛盾日益突显,在这个矛盾之下,现代文明很有可能被毁灭。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从人类工业化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所带来的后果看,凯斯·托马斯先生的预言绝非危言耸听。确实,在资本逻辑框架下,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是,自然科学技术渗透在生产领域,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的使用,电力和化学工业的崛起,机械制造与交通运输的骤增使得人类的工业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宽领域地把人的科技活动与自然的“再造”或者“重塑”结合了起来。一言以蔽之,碳排放的与日俱增,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一次又一次经受现代化的“洗礼”,经受着工业化的“考验”,经受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折磨”: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酸雨腐蚀,工业和农业的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日益迫使人类远离“绿色”。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无法获得适合于饮用的水。全球 20 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 16 个是中国的,中国一半以上的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排放。再循环的概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依然是很陌生”。^① 尽管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联合国接二连三发出的警示报告、盛世危言足以振聋发聩,特别是 21 世纪初叶,人类在哥本哈根热议地球变暖、减少碳排放,有识之士为此振臂高呼,但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似乎并未因此而放慢脚步。

表面看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是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后果,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折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对立),所谓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元素、复杂性问题,既是自然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再进一步反思,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矛盾(对立)问题,更是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这一点我在本书以后章节可能论及,这里还是首先引用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格里芬在他的《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结束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考察:“后现代一词在近些年迅速流传,这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并且开始感觉到,现代不仅有一个开始,还可以有一个结束,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辞或是当代的同义词,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②对现代性的“口诛笔伐”,意蕴深刻,耐人寻味,至少可以肯定,现代科学技术观,特别是现代哲学观、世界观对人与自然关系把握的理念、方式、视角难辞其咎。

从人与人(社会)的关系来考察:在哲学视野中,人,首先直观地表现为一个一个的感性实体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然而,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③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路,我们从国际政治视角考察一下当下人的国际存在形式及其新的矛盾特征便可略见一斑。其一,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国际体系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约束与影响在逐步强化。布热津斯基认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撑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协调。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

① 宋晓军等. 中国不高兴.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95.

② 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9.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的聘用制,经济力量也可能变得更加分散。”^①其二,国际关系更加复杂。民族国家为了更好、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越来越难以过于强调个别领域的差别性,而是要在诸多领域取得平稳,致使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往往需要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在角逐中获得。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这是一个极不稳定、不可能预知结局的时期。历史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变革的前景取决于每个人的行动”。^②总之,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发展将给世界的未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其三,国际关系中“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日益不合时宜。包容性发展思维更加富有远见并日益展示其强大的生命力,民族国家(地区)的角色定位越来越有张力,为各国的战略博弈提供了条件。

现实的中国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如何呢?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中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呢?从社会学视角观之,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且缺少核心技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2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最大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这种辩证思维模式下的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不能不让我联想到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③

这是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创新的时代!自鸣得意,自由自在不行。绝望无奈、无所作为更不行。深刻地意识或领悟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本质,反思人类数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性传统,追问我们赖以生存和寄托的精神家园,面向世界、面

① 唐晋. 大国崛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

② 唐晋. 大国崛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向未来、把握命运、有所作为，才是我们今天的正确选择，这本身就是当下人类不可摆脱的历史命运。

1.2 哲学研究的“失语”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演变确实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社会演变规律，它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黑格尔在论述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时指出：“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实际上，不仅是哲学，全部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时代所孕育的思维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②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命运乃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③因此，要准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将其置于这个时代进行考察。因此，“哲学失语”的命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伪命题。

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所谓“哲学研究的失语”，并不是说当代哲学不语，更不是说当代哲学无语，而是说当代哲学，特别是一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规避了时代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环顾左右而言他”。所谓哲学研究失语不是否定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是意在表达在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民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一系列“两难问题”层出不穷，在困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背影下，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破解的时代语境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关系如何？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大问题。我们不能否认，改革开放 35 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日益壮大，学科体系不断健全，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外学术交流逐步扩大，国际学术影响日益凸显。但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某些研究确实有陷入误区之虞。毛泽东同志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整风时期反对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的学风，在 21 世纪也还似“幽灵”般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游荡、徘徊。

我们且看毛泽东同志对主观主义者的批评：“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具体情况，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

①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84.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122.